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

表 2-5 说明，在华人群体中，虽仍以传统的职业为主，然也有不少新的职业产生。许多新职业的产生，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其余还有许多上海华人中没有的职业，如会计师、土木工程师、医生、药商、制表商、面包商、煤气装配工、潜水员、乐师、律师、摄影师等。这其中不少的新行业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表明此时上海有知识人的绝对数量一定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无疑对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相对来说，租界外国人的平均知识水平当然更高，这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职业有药剂师、书商、牛奶场主、染料工、梳棉工、织布工、洗衣工、翻译、教师、画师、摄影师、牧师等。这表明，太平天国后，上海已流入了西方各种商业和技术人才，不仅有直接从事出版业的印刷排字工人和书商，更有出版业所需的广泛读者。

其次，太平天国使上海的繁荣地域发生改变。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原居上海城厢的居民大批地涌入租界，造成租界人口的集中。小刀会起义一爆发，就有许多原居城厢的居民离开刘丽川率军占领的县城，人们“不断像潮水般地逃进两个租界”，“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五六百人左右，而这时，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激增到两万以上”^①。在 1853 年 9 月 14 日，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中也说：“这次变乱，使上海大受震动，许多买卖人携带家眷逃到租界区躲避”^②。1860 年，太平军攻克苏、杭时，避居租界的华人已达 30 万，到 1862 年，竟有 50 万之多^③。这些挤入租界的人们，“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不仅昔日的金融重心苏州衰落，许多票号移入上海。以后《申报》在追述这段历史事实时说道：“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号交

①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4 页。

② 《小刀会史料》，第 489 页。

③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9 页。

④ 《北华捷报》1863 年 2 月 21 日，见《太平军在上海》，第 478 页。

结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① 这些已入上海的许多票号及原来南市的上海钱业都纷纷移入北部租界。正如后人姚公鹤所云：“适值洪杨举事，内地受兵，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是实，既联袂而偕来，即内地绅富，亦以租界处中立地位，作为世外桃源。商人集则商事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机关乃次第开设，此为北市钱业发达之最初原因也”^②。这样，也使上海的商业重心开始由原来的城厢一带转移到了租界里面。在商业重心北移的同时，一些新的居民点和商业区开始形成；徐家汇即成市于这一时期。^③上海繁荣地域的变化，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南市书业的纷纷北移就是明证。这点，在后文中我们将详加论述。

再者，在太平天国期间，上海的租界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殖民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内乱，在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中，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他们不仅获得了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在租界建立了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在行政上，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上海土地章程》。于是，英、法居留地得以设立，但这三个居留地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种局面在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的大动荡后，由于华界难民的大批涌入租界，为外国人全面控制租界提供了契机。1854年7月11日，西人会议通过土地章程修改案，设立工部局^④。这种工部局，正如英国领事阿礼国所说，它将是“一种市政机关”^⑤，为了商业的利益，西方殖民者开始接受华人人界居住^⑥。在军事上，1853年4月12日，上海西人大会决定组织义勇队。在司法上，1855

① 《申报》1884年1月12日。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④ 张大椿：《上海租界年表》，《上海地方史资料》（二），第85页。

⑤ 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第64页，1931年。

⑥ 徐公肃、丘谨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

年4月，在华当局未允的情况下，英领及工部局均签字允许，使以前的临时警察，“正式成为常备警察”^①。1864年5月1日，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后会审公廨逐渐变质，西人权利逐渐扩大，致使司法权几乎为西人掌管。总之，上海租界基本上脱离了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体系，成为“国中之国”。诚然，这些权利在租界的建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然而，毋庸讳言，这种事权不一的分治格局，造成了一些控制薄弱地带和缝隙。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理念，不管其虚伪性如何，相对于封建专制下的政府来说，毕竟是个进步，之后租界内许多进步书籍的出版，都是借助于这个“国中之国”。它对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在太平天国初期，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传闻太平天国运动在内地发展起来”，由于信仰的关系，他们觉得《圣经》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为了大量印刷《圣经》，上海伦敦会“将几部大机器运往上海”，并昼夜印刷了几十万册的《圣经》。直到“了解到有关太平天国的事，到他们败绩的显露，发现并非像原来所估计的那样急需出版和发送上百万册《新约全书》”时，才“根据当时的情形，工作进展速度缓慢了下来”^②。这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义，一度引起了上海传教类书籍出版量的增大，并使当时上海不多的机器印刷设备得以增加。

二、都市的器物文明与华人民办出版业的文化采借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开办的近代出版业，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出版理念和经营方式，对上海的民办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港口优势的日益突出，都市的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一些传教士看到了在上海的传教优势，有的将出版机构移入上海，如美华书馆1860年由宁波迁到上海，1863年香港同治印书馆从香

^① 徐公肃、丘谨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② 麦金托什：《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港迁入；有的在沪设立新的出版机构（见第二章第一节表 2-1）。此时，不少外埠书业也纷纷向上海聚集。如一些商人、买办为书业利润的驱使，争相在沪经营起出版业。这样，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中，既有外国人经营的出版业，又有国人经营的出版业。既有从外埠迁入上海的出版机构，又有直接在上海建立的出版机构。有用传统雕版印刷书籍的，也有仿效西人铅印、石印的技术来印刷书籍的。这些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而租界内华洋杂居的状况，又加速了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文化采借显得尤为突出。

所谓文化采借（culture borrowing），是指对外来文化元素和文化集丛^①的借用。它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仿效，是文化积累的途径之一。两种文化接触后发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互相采借对方的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采借双方并不必定是完全对等的关系，采借也不是对所有外来文化的全部吸收。文化采借大多是相对落后的社会采借发达社会中的先进文化元素，相反的情形十分少见。采借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否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越大的文化元素，越容易被采借；反之，则不容易被采借。第二，是否合乎本土的文化模式。凡是与本土文化模式相协调或差异不大的文化元素，就容易被采借；与本土文化有抵触或差异大的，则不易被接纳。第三，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凡是符合本民族特征的文化元素，不论是守旧的还是新奇的，粗糙或者精制的，都可能被采纳。在文化的采借中，一般的情形是物质文化的采借先于或多于精神文化的采借。这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利用价值比较容易判断，它与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冲突，因而易于被接纳。而精神文化则不同，一种理念或观念往往打上民族或阶级的烙印，与其他民族或社会的传统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它的传播与采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力。

^① 文化集丛：功能上互相整合的一组文化特质。又称文化丛。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发挥作用。文化集丛通常是以某一文化特质为中心，结合一些在功能上有连带关系的特质而组成的，其中每个特质都围绕中心特质而对于整体发挥作用。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印刷业 1843—1949

这时上海西人所经营的出版业，无论是在器物上，还是在经营方式和理念上都是远远超越于国人的先进文化元素，其快捷的印刷技术、独到的经营方式，对于正在经营或意欲经营出版业的国人来说，都太具有使用价值了，因此，对西人出版业中显现的先进文化元素的采借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出版技术这种器物文化自然就成为国人首先采借的文化元素。

自墨海书馆始，上海开始有了近代铅印设备，除大小英文铅字七号外，并刻有中文铅字两号（等于二号、四号大小）^①。1860年，美华书馆由宁波迁到上海，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发明。其一是在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比传统的手工雕刻字模省时省力，制造的字模也更完美、清晰。书馆用电镀法制成大小七种宋体铅字（即1—7号字），大量生产和销售，成为流行几十年的“美华字”。其二是设计了元宝式排字架，将汉字按照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在木架的正面安置常用、备用铅字，两旁安置罕用铅字，每类字依据部首法排列，使排版取字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铅印技术凸显出的更高的使用价值，使不少从事出版业的国人纷纷仿效，这也使得上海的铅印出版业在整体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然就华人对西方印刷技术的仿效而言，在近代出版业的前期，作为主流的并不是铅印技术，而是在当时比铅印技术更具使用价值的另一种印刷技术——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为1796年德国人奥人施纳飞尔特（Alois Senefelder）所发明，传入我国的时间，说法不一。贺胜鼐在1931年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中说：“吾国只有石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研究资料》中也从贺说。汪家熔在其《印刷史三题》中认为在1838年广州就有石印术，并推定戈公振商务版《中国报学史》的插页《六合丛谈·小引》为石印^②。吾觉汪说较为可信。也即是说，石印术在上海最早应用的时间为1857年。其后，土山湾

① 贺胜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58页后注。

② 《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印刷所也采用石印术，不过所印仅限于天主教之宣传印刷品。上海最早以石印技术印制书籍的单位为 1876 年英商美查办的点石斋石印局。该局开办后即聘土山湾印书馆技师邱子昂执掌印务。第一种出版物为《考正字汇》^①，后印制横栏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监类函》及《四书》等大部书^②。此外，它还率先用石印技术在沪上出版了《点石斋画报》。此后，国人对这种文化元素的采借更为积极，石印业很快发展成一种重要的行业，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89 年 5 月 25 日《北华捷报》说：“上海已在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到光绪末年，上海石印书局迅速增至 90 家^③。至于为何石印业得到如此快的发展，或者说国人为何采借此种文化元素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石印与铅印、木刻相比有独特的优势。铅印所需铅字很多，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需要许多大小不同的字体、字号的铅字。当时姜别利虽已发明电镀法制作华文铜模，但所需时间很长。时“铅字每套之值恒在一二千元之上，铜模之价尤昂”^④，一旦出现没有之铅字，则不得不借助于木刻字，于是普通印件中，遂不时有墨铅或空白，故当时正式书籍之印刷，仍多付之木刻。只有一些较大的印刷出版机构，才能自置铜模，临时添制铅字。至于木刻印刷，所需刻工既多，费时费钱又多。正如王汉章所说：“但铅石印法，初不必逊于木刻，至于省工省费，则又远过之，二者并行，实不相悖也……顾我国出版界基于世界潮流之趋势，几使铅石印法占有崇高之地位、伟大之势力，以致木刻渐成衰落景象。加以生活日昂，工价倍徙，刻字匠人之收入，不敌排印工人之丰厚，相形之下，优绌斯分，趋舍自异矣。”^⑤ 时人在

① 贺胜鼐曰为《圣谕详解》，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70 页。

② 王汉章《刊印总述》内张静庐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72 页。

③ 宋原放、孙颢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④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 355 页。

⑤ 王汉章：《刊印总述》，《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 362 页。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

论照相石印法比原有的铅字袖珍版更为经济时说：“今石印之法工简而本轻，较之袖珍版式质属更易，由此二法，直是无书不可印，而无本不可缩。”^①除更为经济外，石印还有另一个优点，即比木刻更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关于这一点，时人徐润有所论述：“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②正因如此，后来上海的许多画报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皆为石印。当时有诗极言石印之优点：“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板易；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工鬼斧泯无迹。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册付贞珉。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③

其二，适应了当时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当时大量的经史书籍，因木刻价昂，士子买不起。所谓：“借书而无世家往来，买书而无薪膏余口，竭终年舌耕之所入，不足供一部书之价，则忍而不读者有之矣。吾知若此者十人居其九也。”^④石印书籍价格之低廉，正满足了读书人的需要，而对赶考的举子来说，除价格低廉外，更是另有一番意义。1889年5月25日的《北华捷报》中的一段话对此述之较切：“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十分需要这种书籍……《康熙字典》售价，各种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字很小……木板大字的售价三元至十五元……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年青，目力好。他们不要宽边大字，而喜欢旅行时便于携带的小书。举子们需要赶路，又喜欢带书。”此外，清后期考风腐败，夹带之风兴盛，因而“字迹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⑤的石印书籍，这种场屋之佳品，尤其被士子所青睐；故“其时业石印者多竞印八股诗文，场屋用书”^⑥。如李木斋（盛铎），所设蜚英馆，就石印“场屋

① 《申报》1882年11月2日。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版。

③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内吴友如所绘“点石斋石印工厂图”下注。

④ 《申报》1882年12月17日，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554页。

⑤ 《申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⑥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68页。

用之夹袋书，所谓巾箱本之兔园册子”^①。陈伯熙《老上海》中在记鸿文书局之失败时，如是说：“（鸿文书局）惟所出者多科举时代考场所用之书，如《五经笺造》、《五经汇解》、《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等类……迨科举既废，遂不值一文矣”^②。这些都说明石印业的兴盛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后来石印业的衰落，固然与铅印技术的进步有关，科举的废除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很高的经济回报是投资者的内在动力。外商石印书籍销行之盛，强烈地诱惑着华人的投资。姚公鹤在其《上海闲话》载：“闻点石斋第一本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当时一般书只能销售几百册，多者不过两千册。而点石斋的这本石印大部书籍却几个月以内，就销出十万册，此诱惑可想而知。于是，在1882年就有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和鸿文书局几家规模较大的石印机构成立。石印业在19世纪80年代后开始兴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绪五年，英商开乐凯（John Dent Clark）和李闰登（Charles Rivington）合伙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文汇报》，首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使投资石印更有利可图。以后，彩印技术在沪上的出现，又引起许多彩印书局的出现。总之，都市整体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光绪年间石印出版机构能够大量涌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

这一时期，国人所办的民族出版业，带有明显的对西人出版文化采借的痕迹。这种采借不仅表现在印刷技术上的，还表现在融资方式和出版机构的组织形式上。在印刷技术上，自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后，国人由好奇到羡慕，再到仿效。19世纪70年代，上海民族工业中有两家印刷工业，80年代增加很快，到甲午以前，有9家印刷机构出现^③。一些老书肆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62页。

②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68页。

③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 1843—1949

如扫叶山房等也开始使用石印机器出版书籍。从融资方式上说，国人以前所办的出版机构，要么独资，要么几人合资，从不知利用社会资金以扩大资本，减轻资金周转的压力。随着外人在上海投资企业的增多，以及一批洋务企业的出现，已有不少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新的融资方式开始为国人接受，华商附股者不少，甚至采取了同洋商合办的形式。但这时的出版业中，纯粹的股份制形式还没有形成，多为几人合资的形式。过去有人看到“股印××”就认为出版业中已有了股份制企业，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它不过是书籍发行的一种预约形式。这种预约形式的好处是不会造成书籍的积压，当然，它最大的好处还在于让商家可以减少投资成本，通俗地说，就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这在出版需投资较多的大部头书籍时，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同文书局在光绪十年（1884年）在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时，首先采用了这种方法。现选抄一段如下：

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

……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一部，用以备校，约两年为期，其功可竣。去年曾经启知，以招印一千五百股为额，并呈书样四式，嗣蒙诸大雅示复，皆以字大行疏，每部三百六十两者为最，本局谨遵众论，即照三百六十两样本开办。凡来认股者，先交半价银一百八十两为定，一俟目录告成之日，在登申报通知在股诸君来取目录，即将所余半价交足，本局并发分次取书单三十二纸，以后各典续出，随出随取，俾臻两便。目前股份尚未足数，如欲购是书者，尚祈及早惠临，庶几股额早满，藏事亦速，是所厚望矣。

股印二十四史启

……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邑大都，必有度藏全史，以备大雅观摩者；兵燹而后斯文浩劫，志学之士欲求全史而读之，盖有登天之难焉。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

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预交英洋一百元掣取收条，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各史随出随取，两得其便。现经添设汽炉，日不停晷，较诸人力尤为敏捷。《陈书》、《史记》、《前汉》等书既以告成，《后汉书》、《三国志》俱可计日而就。目前股份尚未足数，欲购者请早来局认取股单；若使各史迭出，股额足数，即行截止矣。此启。^①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股印”、“股份”是书籍的预约，而不是股份制企业。我国民办股份制出版企业到20世纪初才出现，民国以后有较大发展。这种“股印”在当时的上海的出现，明显受到西人融资方式的影响。这种经营方式使民办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经营方式，像《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这样的大部头书籍是很难被出版的。这种方式还对后来的上海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国以后上海的民办出版业中，这种经营方式被广泛采用。

在出版机构的设置上，国人一开始就有仿效西人的痕迹。在点石斋石印书局营利后，继办者就有粤人徐润（雨之）之同文书局，扬州李木斋（盛铎）之蜚英馆，湖州凌佩卿之鸿文书局，钟寅伯之积石书局，何瑞堂之鸿宝斋石印局等^②。铅印中徐润的广百宋斋，许时庚之绿荫山房的设立也是仿“申报聚珍版图书”和图书集成局铅印图书的影响。徐润的仿效尤为明显。他在看到英人美查在申报馆附设两书店，一为专售铅印书籍之申昌书室，一为专售石印书籍之点石斋，都盈利不少后，不仅与人合伙创办同文书馆，石印大宗史书，还自设广百宋斋，铅印国学名籍^③，使自己的同文馆和美查的申报馆一样，石印、铅印俱全。在出书的种类上，也多如此，你出《图书集成》，我也出；你出《二十四史》，我也出《二十四史》；你把书缩小，我把字印得更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内部管理上，国人民办的出版机构受西式企业的影响，已门分户别，井井有条。如蜚英馆内就有“东西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69—70页。

② 同上书，第373—374页。

③ 同上书，第362页。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

互对楼房若干幢，分设总账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子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等^①。

三、早期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的规模及其意义

早期的民族机器出版业，既是文化产业，也是上海早期民族工业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外资工业的诱导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早期上海外资工厂的出现，不仅吸引私人资本转而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设厂提供了方便。首先，外资工厂冲破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对私人资本自行设厂的限制，为私人投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其次，外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为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提供了借鉴。如果“华洋阻隔”，则“虽中土技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②。但也正因如此，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必须面对外国商人的强烈竞争。所以，继点石斋之后的华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石印书局，投资都较大。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佣职工五百名”^③，同年设立的拜石山房能与点石斋、同文书局成鼎立之势，盖应与两者规模相当。前面提到的蜚英馆有那么精细的分工，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有人说上海“现在每一个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人”^④。徐新吾《上海近代经济史》中估计到1894年民族印刷业的投资为10万两^⑤，以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为2万元，其余为1万元计，根据是同文书局1893年失火时损失1.5万元而得出。事实上，据《徐愚斋自叙年谱》说，这个数目是同文书局得到保险赔偿的金额，实际损失当不止此数。这样较大规模

① 《申报》1887年1月13日。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

③ 贺胜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70页。

④ 《北华捷报》1989年5月25日。

⑤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57—58页。